

中國教育家喻畧



中国教育家传略

第一卷

四平师范学院《中国教育家传略》编委会

一九八一年十月

实；但是，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加之其它条件的限制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。鉴于这种情况，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，我们先内部印行，在进一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再作修改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诸如哪些人应该上书、应该如何评介、编书的体例等，请写信告诉我们。

本书编委会委员有：马青海、王守谦、李少先、李世邦、徐树、滕吉海，李少先同志任主编。

编 者

一九八一年十月

前 言

在浩如烟海的群书中，还没有专门为中国教育家写传的书。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勤奋工作的人们，特别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者们，迫切希望编辑出版这样的书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（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）的强烈愿望，我们组织起来，着手进行这项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，愿以我们的努力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一点点贡献。

当大家读到本书的时候，我们的编辑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二年的时间。时间不算长，也不算短。编辑这样一部书是不容易的。若不是得到全国教育界、学术界、新闻出版界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这部书是不能问世的。教育部许多领导同志来信热情肯定了这项工作，对我们

给以亲切的教诲，人民教育出版社陈侠、历史学家陈翰笙、教育心理学家朱智贤、经济学家赵迺搏、严仁慈等著名的老一辈专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以大力支持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全国各地的同志给予的支持更是大量的；至于省委宣传部、省教育厅、院党委的关怀则是经常的。因此，应该说这部书的问世既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愿望，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在本书印行的时候，编委会向支持过这项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！

教育部副部长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董纯才同志来信说：“编写中国教育家传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。”尽管我们在编写过程中，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，力求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和介绍教育家的生平、教育活动、教育理论 and 贡献，力求材料翔实准确、语言简洁朴

目 录

徐特立.....	(1)
吴玉章.....	(11)
李登辉.....	(22)
陈嘉庚.....	(29)
黄炎培.....	(38)
陈 垣.....	(46)
马寅初.....	(55)
马约翰.....	(61)
李建勋.....	(66)
马叙伦.....	(74)
许崇清.....	(81)
林砺儒.....	(83)
李四光.....	(92)

李 达.....	(102)
陈望道.....	(110)
陶行知.....	(118)
吴贻芳.....	(1 ² 7)
舒新城.....	(1 ³ 2)
孟宪承.....	(1 ⁴ 0)
叶圣陶.....	(147)
杨贤江.....	(153)
成仿吾.....	(159)
车向忱.....	(135)
王亚南.....	(172)
孙敬修.....	(180)
江隆基.....	(183)
戴伯韜.....	(189)
丁浩川.....	(196)



徐 特 立

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、革命家。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逝世。徐特立是毛泽东同志最尊敬的一位老师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。

徐特立幼年家境很穷困，四岁丧母，父兄种田，虽终年劳作，一家仍不得温饱。九岁始入蒙馆，读过朱伯庐的《治家格言》和杨树山的《遗嘱》。十五岁时，跟个身为和尚的老师学八股文，也读佛家的禅宗语录，初步了解一些唯心派

的哲学。十六岁那年，家境愈趋贫困，辍学在家，自学祖父遗留的医学一类的书籍，拟以医为职业。后来又改习科举，学写八股文。这样，徐特立在十六岁至十九岁的这段生活里，虽然是“乱撞一顿，毫无成就”，但也养成了“过复杂生活的习惯，破坏了固定不变的思想”。

一八九五年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，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。这时徐特立十八岁，迫于生活，开始在乡村教蒙馆，一直教了十年书。他一边教书，一边刻苦读书，实施他所制订的“十年破产读书”的计划。那时贫穷落后的乡村里，没有可以互相讲习的朋友，更少可以质疑问难的先生。如《尚书》注中有“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为一年”。“四分日之一”是怎么回事？他遍访名儒，皆不知其所云，只好自己去苦思力索。学数学，遇到的困难更多，代数、几何（特别是解析几何）都靠自己找书进行钻研。他外出时，常把一本数学表解放在口袋里，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，边走路，边思索，边记忆，走过一段路之后，想通了，记熟了，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功，他也就找出一些门径来了。

一九〇五年，徐特立二十八岁时，为了寻求更多的知识，来到长沙城的望麓园，考入了宁乡速成师范班。学习四个月毕业后，为了“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”，提高乡村青少年的文化，他和何雨农、姜济寰一起，在离长沙城三十里的梨，创办了梨江高级小学。他不要工资，教几门课，终日繁忙，不辞辛苦。

一九〇六年春天，徐特立应聘到长沙周南女学任教。他知识渊博，教地理、历史、国文、数学等几门课程，教学极

为认真负责，深受学生的欢迎和敬爱。在此期间，有机会阅读鼓吹民主革命的书刊，特别是《民报》，唤起他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。在教课中，他经常向学生宣传民族革命的意义。在“反对割闽换辽”、“反对铁路国有”的运动中，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，印发传单，进行鼓动，发动周南学生罢课，形成了长沙学生早期的罢课运动，有力地推动了湖南长沙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。湖南辰州发生罢教案，当时徐特立正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。他立即召集全校学生作时事报告。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我国，中国人民遭受凌辱，清王朝腐败无能时，他声泪俱下，十分激昂，悲愤至极，竟断指血书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八个大字，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也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。

一九一〇年，徐特立三十三岁，已在中学任教五年，成了长沙各校争聘的有名教师。但他看到“小学教育办不好”，而毅然弃职去研究小学教育。他去江苏，入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。他用四个月的时间，考察了上海等地的许多小学校。不久，又东渡日本参观小学教育。回国后，仍到长沙周南女学任校长兼教员，为了介绍经验，改进教学，提高小学教育的工作质量，他创办了《周南教育》周刊。这是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，在教育界影响很大，它吸引了许多小学教师和学校行政负责人，为民主教育而奋斗。

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徐特立参加了湖南新军的起义运动，被选为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。当时，从议长到议员，关心的不是国计民生，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，追逐的是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。不久，封建官僚势力的代表谭延闿又阴

谋篡夺了革命果实。徐特立愤懑万分，决然辞掉了这个副议长的职务。其后，他又应邀到省教育司任科长。他主张大力发展平民教育，招收城市贫苦孩子入学，竟遭到当权者的反对。他只做了几个月科长，就交还了委任状，去善化高小任校长，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。

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，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员。这一时期，毛泽东同志正在该校学习和进行早期的革命活动。毛泽东同志对他很尊重，他也十分钦佩毛泽东同志。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，他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。一九一五年，他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。他和杨昌济、王季范等先生一起，写信斥责鼓吹帝制的教师，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。一九一九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大规模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，徐特立带领教师积极参加“驱张运动”。徐特立在湖南一师工作多年，一贯主持正义，勇于和腐朽势力作斗争。他教学认真负责，作风勤恳朴实。平时最喜用古往今来先进人物的言行启发学生，并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教育学生，给学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一九一九年，徐特立已经四十三岁，教中小学和高等师范的课已二十年，在湖南教育界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，但他却毅然参加了“留法勤工俭学”活动。他先在法国五金工厂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，并在木兰公学补习法文。一年后入巴黎大学，学习自然科学。在法勤工俭学三年后，到比利时和德国参观考察了十个月。在海外的几年间，他结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朋友，接触了很多新事物、新思想，他热忱地迫切地想为祖国贡献力量，改造祖国落后的面貌。

一九二四年夏天，他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祖国，出自热爱

人民、热爱教育事业之心，又白手起家，借荷花池长沙师范的杂屋，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，招收乡下未考上学校的女学生。他一身兼任校长、教员和校工，每天除了教课，还要摇铃扫地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，徐特立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。他有一个明确的办学主张，不受反动政府和恶劣势力的支配，“宁肯牺牲学校，但决不牺牲自己的主张。”反动派汤芑铭要摧毁的长沙师范，张敬尧要封闭的五美小学，何健在“马日事变”后一度解散的周南和停办的长沙女师，在徐特立的领导与影响下，与反动派展开斗争，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。

徐特立办教育，重实际，重创造，常讲“实际第一、书本第二”。他办学不拘泥于形式，也不太注重学科成绩考试分数，主张学生在校内有较多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提倡多接触社会。他热爱学生，诲人不倦，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，也有缺点和弱点，教育者要善于发现，善于因势利导，发展长处，克服缺点。这样都可以成为有用人材。他主张说服，反对体罚和无理压制学生。认为一切教育都应在和学生平等讨论中进行，而不是单方面的强加于人。

徐特立尤其重视女子教育，大力提倡女子教育，一贯反对孔孟之道和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，深切关心妇女的解放。从一九〇五年起，他自办或协助朋友创办了周南女学、长沙女子师范学校，并任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。

他坚持勤俭办学，爱惜人财物力，反对一切浪费，不管办什么事都是精打细算。一九二七年春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，湖南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。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工作，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

习所主任，全力以赴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。在斗争中，他深刻认识到农民群众的力量，明确地看出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，他英勇无畏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。

同年夏，国民党叛变中国人民，第一次革命失败了。徐特立怒对蒋介石叛变的屠刀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，愤然离开了长沙，辗转到武汉。当时情况非常严重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全国到处一片白色恐怖。这时，有许多动摇分子纷纷脱党，有的投降了敌人。在此革命危急关头，徐特立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对党内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使全党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，增强了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底，徐特立赶赴南昌，参加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、叶挺和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著名的南昌起义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

一九二八年，党组织派他去苏联，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五十二岁的徐特立，学习特别有劲头。他坚信“革命有前途，国家有前途”。他说：“我纵然六十岁就入棺材，也可以干上八、九年”。

一九三〇年，徐特立从苏联回国，冲破重重困难，到了江西苏区。他在苏区担任教育部长。当时，苏区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反“围剿”的紧急战斗。在战火纷飞、硝烟弥漫、敌人层层封锁的困难条件下，他坚持发展了苏区的教育事业。他苦心筹划，因陋就简，创设了地方识字班、训练班，提出“老公公教老婆婆，儿子教父亲，秘书教主席，识字的教不识字的、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”口号，掀起了扫盲运动。在普及基础上，徐特立还创办了农业学校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

农业技术人员和小学教师。

一九二五年，徐特立以五十八岁高龄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他是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一人，但他不辞劳苦，与大家一起度过了我国革命征途中的一个最困难的时期。因他年高，组织上给了他一匹马，但他常常把马给体弱有病的同志骑，自己手持竹杖，脚踏草鞋，跟大家一起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历尽千难万险，一直保持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人们称他为长征路上的老英雄。长征胜利后，他到达陕北，继续担任教育部长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，延安各界为徐特立的六十寿辰举行庆祝，毛主席给他写了贺信，说：“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，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，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。当革命失败的时候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，有些人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，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，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。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，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，还要不怕困难，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。什么‘老’，什么‘身体精神不行’，什么‘困难障碍’，在你面前都降服了。而在有些人面前呢？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。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，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‘半桶水’，却偏要‘淌得很’。你是心里想的，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，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，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。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，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。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，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，自己并不包括在内。你是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，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

第一，休息第一，与自己第一。你总是拣难事做，从来也不躲避责任，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，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。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，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，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。”

西安事变后，一九三七年冬，党中央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而特派徐特立到湖南，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，指导团结抗日力量，特别是教育革命青年，介绍了大批革命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。一九三九年，办事处撤销，他回到延安，继续从事党的教育和宣传工作。担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，并亲自编写教科书，亲自为学生讲课，还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连续发表文章，论述发展自然科学的道路。

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徐特立被选为中央委员。

一九四七年，徐特立七十大寿。一月十日，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“坚强的老战士”，周恩来同志题写了“人民之光，我党之荣”，朱德同志写了“当今一圣人”的题词送给他，表示祝贺。党中央也给他写了贺信，信中指出：“你的道路，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。……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，在敌人面前，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，你的充沛的热情，使懦夫为之低头，反动派为之失色。”党中央赞扬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，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。

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，徐特立来到北京，已经是七十二岁的人了，但他仍是那样精神焕发，每天都要坚持八小时以上的工作。他订出了二十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。在北京的生活仍和在延安时差不多，常吃粗粮，几块白薯，一碗青

菜。衣着很朴素，几套延安穿过的破衣服，总是舍不得换掉，一件呢大衣加了几处补丁。他的工作热情和劲头赛过青年人，每天从早到晚，开会、讲课、写文章，看书学习，忙个不停。建国初期那几年，他写了大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。他曾领导一些历史专家和党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编写《中国通史》。每天商讨问题，审阅文稿，反复推敲，期于至当。研究某一个问题，常常苦思力索，日中如果没有得出结论，晚上睡醒后还要思考。道理想通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就是在半夜也要起床详细记写笔记。为了写一篇文章，或草拟一段讲稿，他常常参考几种或几十种书刊。

一九五〇年，徐特立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写信，希望他们建立“实事求是，不自以为是”的校风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回到了离别十多年的长沙。学校、医院、工厂和机关等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请他作报告。讲话中他经常说：“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开路先锋，也是建设祖国在战斗中打头阵的人，责任很大，困难很多，我们必须多吃苦。”一九五八年，他满怀喜悦的心情为《陕西日报》读者题词：“勤工俭学，是具体体现学习和劳动相结合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要途径，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、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、合于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方法。”一九六二年，他给《长沙日报》题词：“创业难，守业更难，须知物力为艰，事事莫争虚体面，老老实实，勤俭建国，发愤图强。”这是他一生始终坚持的伟大精神的写照。一九六三年二月，长沙师范（湖南幼师）建校五十周年，他亲笔题词：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，以雷锋事迹为榜样，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而奋斗！”三月，他在上海题词：“实事求是，不自以为是；虚心

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”这些题词体现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爱护。

徐特立同志逝世后，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毛泽东主席献了花圈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大会。

徐特立的主要著作搜集在《徐特立教育文集》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）中。